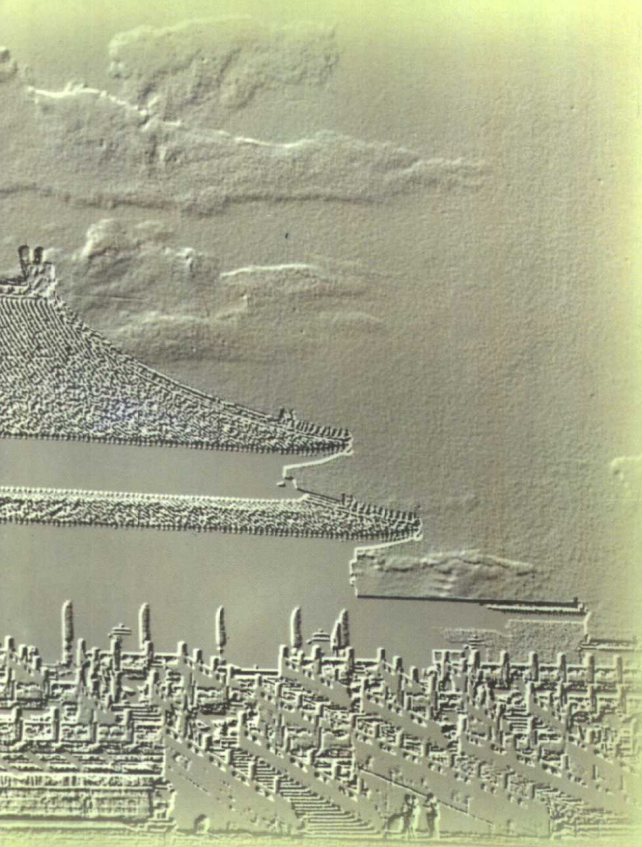


于德源 著

北京

历代城坊、
宫殿、
苑囿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历代 城坊·宫殿·苑囿

于德源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 新 208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历代城坊·宫殿·苑囿/于德源著.-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

ISBN 7-81039-640-4

I. 北… II. 于… III. 名胜古迹-概况-北京 IV. K928.7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871 号

BEIJING LIDAI

CHENGFANG · GONGDIAN · YUANYOU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国马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12.60 元

前 言

北京是中国七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安阳）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至今仍保存比较完整的古老都市。北京作为全中国的统一政治中心虽然只有 700 余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古老城市，以及区域性的方国都邑来说，则至少有 3000 余年的历史了。北京在古代称蓟城，先秦时期曾是燕国都城；秦为广阳郡治所；西汉先后为燕国、幽州燕郡、广阳国、广阳郡治所；王莽时改广阳国为广有郡、蓟县为伐戎，蓟城仍为治所。东汉建武十三年（37 年）省广阳国并于上谷郡，和帝永元八年（96 年）复置广阳郡，蓟城又恢复为广阳郡治所。自曹魏以下，蓟城或为幽州燕郡治所，或为燕国治所。十六国时期，前燕鲜卑慕容皝还曾一度在此建都 6 年（352—357 年）。隋大业三年（607 年）废幽州为涿郡，唐武德元年（618 年）复改为幽州，治所均仍在蓟城。唐代，蓟城又称幽州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废幽州为范阳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复改范阳郡为幽州，蓟城仍先后为郡、州治所。辽会同元年（938 年）升幽州为南京，建为陪都，又称燕京，蓟城则称南京城或燕京城。金朝灭辽以后，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 年）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展其东、西、南三面，次年竣工。贞元元年（1153 年），改燕京为中都，迁都于中都城。元朝灭金以后，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 年）十二月决定以金中都城东北的原辽、金离宫为中心，修筑新城，次年（1267 年）正月兴工。至元九年（1272 年）命名为大都，

定为京师。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大都城基本竣工，历时18年。明初改元大都为北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改北平名北京，为陪都。永乐十八年（1420年）以北京为京师，宣布迁都。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从南京迁都北京。明朝占据元大都之初，即洪武元年（1368年），将北城垣南缩五里至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明成祖决定迁都北京后，永乐十七年（1419年）又将南城垣向南拓展二里至今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一线。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边警日急，于是增筑北京南部外城，全城形势遂成“凸”字形。清代相沿不改。

据史籍记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蓟城的城郭、宫殿曾屡遭破坏。例如，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为防止六国旧贵族据城叛乱，下令“坏城郭，决通堤防”^①。当时秦始皇正东巡碣石，近在身边的燕都蓟城城郭当然难以幸免。十六国时期，公元314年羯族首领石勒攻陷蓟城，杀西晋幽州刺史王浚，“焚烧城邑，害万余人”^②。城中宫殿，付之一炬。事隔70余年，公元385年，后秦幽州刺史王永为后燕将军平规所败，临逃跑前，“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烧和龙（今辽宁朝阳）、蓟城宫室”^③，蓟城再次遭到破坏。辽金之际，公元1122年金人陷辽南京（即蓟城），临撤离前亦“大毁诸州及燕山（即蓟城，宋称燕山府）城壁楼橹”^④。但是，随着政治权力的转移，根据新统治者的需要，蓟城在战火之后，又往往能得到修复和发展。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② 《晋书》卷五《孝惠帝纪》。

③ 《晋书》卷一百十五《苻丕载记》。

④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引《北征纪实》。

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公元前 209 年韩广受燕国旧贵族推举，据薊城自立为燕王，在位 4 年。为据地自固，韩广当修复被秦始皇平毁的薊城城郭。公元 350 年前燕慕容儁攻取薊城，公元 352 年并以薊城为前燕国都^①，铸铜马、建碣石宫，多有营造，消除了曾被石勒焚毁的痕迹。公元 389 年后燕以长乐公慕容盛镇守薊城。慕容盛又修复了被前秦幽州刺史王永焚毁的薊城旧宫^②。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特别是早期城市的设置，往往主要受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但是，当决定在某一地区设置城市以后，其在该地区内的具体位置却是由周围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就明确提出了选择城址的标准。其“乘马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度地篇”云：“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都，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水之泻，因大川而注焉。”质言之，合理的城址应是既能保有充足的水源，又能有效地避免洪涝之害的傍山临水高敞之地。

城市的生存和水源有密切关系。历史上曾有很多著名城市，或因河流改道而废毁，或因水源枯竭而衰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大古都，无不依傍大河、大江而持有丰富的水源，如安阳殷墟之有洹河，洛阳之有洛水、瀍水、涧水，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有渭水，大梁（今河南开封）之有汴水，南京之有长江，临安（今浙江杭州）之有钱塘江，北京之有永

① 《晋书》卷一百十《慕容儁载记》。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晋纪二十九，孝武帝太元十四年。

定河（古称瀑水）、高粱河、西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北京古代城址的变化和河流水系的变迁有密切关系。位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的西周燕国都城之所以被放弃，主要原因是其距圣水（今大石河）出山口不远，城南端常遭水患的缘故。元朝之所以放弃金中都城（位于北京广安门一带）而于其东北别筑大都城，固然有中都城过于残破等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原金中都城所依赖的莲花池水系水量严重匮乏，不能满足作为全中国统一政治中心的元朝京师的城市、宫苑用水，更不能满足每年供应三四百万石粮食的漕运需要。因此，金中都城东北的高粱河（瀑水故道之一）水系上的辽、金离宫旧址就成为建筑新都城的最好位置。

历明、清两代，北京城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规模宏大、壮丽的都市。雄厚高大的城墙，整齐的道路，气势恢宏的宫阙群，遍植奇花异卉、设计绝巧的宫苑，星罗棋布的民居，无不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表现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

目 录

前 言	(1)
一、周初的燕都	(1)
二、东周——汉代的蓟城	(14)
三、东汉以后蓟城的迁移	(21)
四、唐代的幽州城	(26)
(一) 唐幽州城郭	(26)
(二) 唐幽州城内子城和建筑	(31)
(三) 唐幽州城的坊和市	(35)
五、辽南京(燕京)城	(40)
(一) 辽南京(燕京)城郭和城门	(40)
(二) 辽南京(燕京)皇城	(43)
(三) 辽南京(燕京)宫室	(49)
(四) 辽南京(燕京)苑囿、离宫	(56)
(五) 辽南京(燕京)坊市和街道	(60)
(六) 辽南京(燕京)佛寺	(63)
(七) 辽南京(燕京)衙署	(68)
六、金中都城	(70)
(一) 金初对辽南京城的改造	(70)
(二) 海陵王展筑燕京城,立中都	(74)
(三) 金中都城郭和城门	(78)
(四) 金中都皇城和宫城	(90)

(五)	金中都宫室·····	(94)
(六)	金中都坛庙、山陵·····	(110)
(七)	金中都苑囿、离宫·····	(115)
(八)	金中都坊市和街道·····	(124)
七、元大都城	·····	(130)
(一)	元朝定都燕京，营建大都城·····	(130)
(二)	元大都城郭和城门·····	(138)
(三)	元大都皇城、宫城和宫室·····	(144)
(四)	元大都坛庙·····	(162)
(五)	元大都坊市和街道·····	(167)
八、明代的北京城	·····	(172)
(一)	明北京城郭和城门·····	(172)
(二)	明北京宫室和西苑、南海子·····	(185)
(三)	明北京坛庙、山陵·····	(205)
(四)	明北京坊巷和市·····	(209)
九、清代的北京城	·····	(214)
(一)	清北京宫室和西苑、南苑·····	(214)
(二)	清北京西郊园林·····	(221)
(三)	清北京坊巷和市·····	(243)
十、北京古代城址变迁的启示	·····	(247)

一、周初的燕都

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灭商，西周王朝建立。据史书记载，周初分封诸侯，在今北京地区除封有燕国外还封有蓟国，但关于受封者的身份及其与燕国的关系，由于年代久远，备有歧说。《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所谓黄帝之后、帝尧之后，具体所指均不可确知，所可知者惟有召公。召公姬姓，名奭，是与周王室同姓的宗室贵族。武王死后，召公与周公共同辅佐幼主成王，为大保，“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①。陕，《史记集解》引何休曰：“盖今弘农陕县是也。”弘农陕县即今河南陕县。可见周初召公是与周公地位相埒的宗室重臣。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死后，百姓以其曾决狱于棠树之下，而不伐棠树，作《甘棠》诗歌颂其德。但是，周初召公受封的燕国是否就在今北京地区？燕都是否就是蓟城？由于史文简略，史家始终没有一致的结论。总计起来，主要有四种意见：一说认为黄帝姬姓，所谓黄帝之后即为召公，周初燕国就在蓟地（今北京）。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召者，畿内菜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后武王封之于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今北京广安门一

^①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

带)是也。亦以元子(长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十三《礼记音义之三·乐记十九》云:“黄帝姬姓,君奭盖其后也。”朱彝尊《日下旧闻》亦云:“召公所出,众说纷纭,当以陆德明为是。盖《乐记》所云封黄帝之后于蓟者,即召公也。”一说黄帝之后或帝尧之后初封于蓟,嗣绝,成王复封召公奭于蓟为燕国。毛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云:“《舆地广记》: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又封召公于北燕,其后燕国都蓟。《诗补传》曰:蓟后改为燕。……或曰黄帝之后封于蓟者已绝,成王更封召公奭于蓟为燕。”一说周武王封召公奭的燕国乃在今天津蓟县一带,后燕国吞并蓟国而迁都于蓟。《史记正义》云:“《括地志》:燕山在幽州渔阳县(治今天津蓟县)东南六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一说周初燕国在今河北涞水县境。《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七“易州”:“废涞水县在州北十二里,……按县地即周公封召公于此也。”

归纳以上四说,可分二类:一类认为周初燕国与蓟国同为—事。燕与蓟,—为国名,—为地名,燕国都蓟。一类认为周初帝尧之后或黄帝之后的蓟国都蓟(今北京前身),蓟国绝灭之后,燕国始据其地,并以蓟为都。

以上诸说究竟谁是谁非,数百年来难以判断。后世学者也只是以古代学者的推测为依据,各执—端,聚讼纷纭。但是从本世纪60年代,这个问题开始有了解决的线索。近年来的考古学成果可以肯定西周初封的燕国就在今北京地区,其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

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在今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区东南,今

河北涿州市北，其范围包括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和涸城等村，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大石河流经遗址西侧和南侧，京广铁路从遗址东部穿过。大石河古称圣水。《水经·圣水注》载：“（圣）水出（上谷）郡之西南圣水谷，东南流，迺大防岭之东首。……又东迺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其水伏流里余，潜源东出，又东，颓波泻涧一丈有余，屈而南流也。圣水南流，历（良乡）县西转，又南，迺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有防水注之。（防）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而东南流迺羊头阜下，俗谓之羊头溪，其水又东南流，至县东入圣水。圣水又南与乐水合。（乐）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东南流历县西，而东南流注圣水。（圣水）又东迺其县故城南，又东迺圣聚南，盖藉水而怀称也。又东南与侠河合……世谓之侠活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沟也。”今大石河发源于大房山，东流南转，自坨里以下一段为伏流河，在今房山县城东南复出为地面河，与众水相汇而下。在大石河伏流上源有地名“口头”，再上源有“白石口沟”，与《水经·圣水注》所述圣水“东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其水伏流里许，潜源东出”，大致相符。防水是圣水支流，即今丁家洼河。今丁家洼河与大石河伏流之间有地名“羊头岗”，当即古防水所流经的羊头阜。乐水即今周口店河，这是一条十分古老的河流，也发源自大防山。圣水与防水、乐水相汇后，东南流，“东迺圣聚南”，复东南流与侠河相会。侠河即今夹括河，其上源为牯牛河。今大石河（古圣水）与夹括河（古侠河）相会处正在董家林南，故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当即郦道元所谓“圣聚”^①。《说文解字注》云：“聚，积也。积以物

① 此承教于尹钧科先生。

言，聚以人言，其义通也。”当时人虽知道这里是先民祖居之地，但详情已不能明白，故因圣水流经其地而名之曰“圣聚”，即所谓“藉水而怀称也”。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就发现了这处遗址，并在刘李店、董家林等地做过小型试掘，以后又进行大规模发掘。

根据目前发表的考古报告，我们可以了解到：1962年在刘李店遗址中发现8件骨器，分别为笄、锥、镞等。石器3件，其中2件为长方形的石刀，另一件为石杵。出土物中，陶器占绝大多数，分别为鬲、甗、盆、簋、罐、缸、纺轮等。陶器的制法分泥条盘筑、模制、轮制三种。陶鬲的器形可分为三式，其中第3式鬲的形制与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殷商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相同。陶簋为泥质灰陶，其形制与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同类器相同。根据这些器物的形制，可以判断刘李店遗址的年代，最早可到商代^①。

1973年在刘李店村南又发现两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夏家店文化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种北方文化类型，因较早发现于辽宁省赤峰市夏家店村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大致北起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西拉木伦河，南至河北省东北部，遍于燕山南北。夏家店文化初步可分为燕南型和燕北型。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燕南型仍可分为不同类型。今北京地区正处于夏家店文化圈的南缘。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一般认为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最晚不超过西周早期。在刘李店的这两座古代墓葬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筒腹鬲”、“圆腹鬲”、“敛口罐”和铜耳环等物。“筒腹鬲”，敞口

^①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

直腹，矮裆实足，同类器物曾见于辽宁赤峰药王庙和夏家店村的文化遗址。“圆腹鬲”，敞口短颈，圆腹袋足，同类器物曾见于辽宁赤峰、河北大厂、唐山小官屯和北京昌平雪山村等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敛口罐”，敛口，边唇稍微外侈，短颈，肩腹无明显分界；同类器物曾见于唐山小官屯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铜耳环也曾见于唐山小官屯和北京昌平雪山村遗址等地。根据出土器物比较，可以判断这两座墓葬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但年代较晚，或相当于商代晚期^①。

在琉璃河刘李店村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代文化遗物，表明在殷人势力向北发展到燕山地区时，这里曾一度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文化。质言之，这里同时存在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土著民族和殷人的活动。1977年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村发现的一座商代墓葬中，除出土具有典型中原商文化风格的铜鼎、鬲、甗、爵、卣、罍、三羊尊、盃、盘等礼器外，还出土了具有典型夏家店下层文化风格的金耳环和臂钏。这更说明今北京地区在当时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文化互相融合的情况^②。

刘李店遗址的东南是黄土坡村。在黄土坡村附近有一处大规模的西周燕国墓葬遗址。京广铁路从中穿过，将遗址分为东、西二区。从1973—1979年，共在铁路以西的Ⅰ区发掘了33座墓葬和3座车马坑，其中7座墓葬有奴隶殉葬；在铁路以东的Ⅱ区发掘了27座墓葬和2座车马坑。以上这些墓葬可分为四期：第一期属商代晚期，第二期属周成王时期，第

^①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②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三期属周康王时期前后，第四期属西周中期或晚期的墓葬。值得注意的是，Ⅰ区墓葬和Ⅱ区墓葬在文化上存在着明显差别。例如，7座有奴隶殉葬的墓都发现在Ⅰ区，且该区均为中小型墓葬，普遍有殉狗现象，随葬陶器多由鬲、簋、罐构成，这和河南安阳殷商墓基本相同。而在Ⅱ区发掘的墓葬，无论规模大小，都没有发现奴隶殉葬的情形，且极少殉狗，随葬器物由鬲、罐构成，表现出与Ⅰ区墓葬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形态。在黄土坡遗址Ⅰ区发现的奴隶殉葬墓当是在燕地的殷商遗民的墓葬，而Ⅱ区的墓葬当是西周燕国贵族和平民的墓葬。

黄土坡西周燕国墓葬遗址对于确定周初燕都有重要意义。据考古报告介绍，其情况如下。

黄土坡遗址Ⅰ区发现的7座奴隶殉葬墓中，殉葬的奴隶7—17岁不等，多为男性少年，间有女性青年。这7座墓葬共出土铜礼器19件、铜兵器12件、铜工具6件、陶器101件、釉陶器4件，以及用玉石、蚌、蛤蜊、象牙等制作的饰物。在出土物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带有铭文的铜器。如52号墓出土的一件盾饰，背面铸有阳文“匱（燕）侯”二字，明显地说明了该遗址与西周燕国的关系。该墓出土的“复鼎”，铭文为“侯赏复贝三朋，复用乍（作）父乙宝鬲彝。其”；“复尊”，铭文为“匱侯赏复冏衣、臣妾、贝，用乍父乙宝鬲彝。其”。根据与同型器比较，可以判断是西周早期康王时代器物。53号墓出土的“攸簋”，器内铭文为“侯赏攸贝三朋，攸用乍父戊宝鬲彝，肇乍纪”。根据纹饰判断，其年代应在西周康王、昭王之际。54号墓出土的铜盘，其年代可早至商末周初时代。

在52号墓的南面有3座车马坑，均为整车埋放。陪葬的车置于坑的中部，舆北辕南。车辕两侧，各有埋放马的长方形土坑。车为木制，马身均有各种饰物。

过去在北京地区曾不止一次出土过西周铜器，最著名者就是清代传说出土于卢沟桥的“亚盃”。据《攀古楼彝器款识》载录，有盃1件、卣1件、爵2件、觚1件，俱同一人所作器。铜盃铭文为“曷侯，亚矢。匱侯易（賜）亚贝，用作父乙宝罍彝”。解放初，在北京西郊也曾出土铜觚，据认为也是西周早期遗物。北京地区历年来西周燕国铜器的发现和琉璃河黄土坡西周燕国墓葬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说明今北京地区和西周燕国有密切关系^①。

黄土坡遗址Ⅱ区的发现最有意义。至1979年为止，共发掘了27座墓葬和2座车马坑。251号墓出土“伯矩鬲”、“单子尊”、“单子卣”、“伯矩盘”和“庶觶”等铜器，其中“伯矩鬲”造型庄重、华丽，铭文为“在戊辰，匱侯易（賜）伯矩贝，用作（作）父戊罍彝。”253号墓出土“堇鼎”、“圉觶”、“圉卣”、“圉方鼎”等器，其中“堇鼎”最为珍贵。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件高62厘米、重41.5公斤的重器，而且在于该器内壁铭文内容十分重要。铭文为“匱侯令堇饌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作太子癸宝罍……”“大”“太”相通，大保即太保。《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位为三公之一的太保，是召公在成王时的官职。铭文中所说的太保就是召公奭，也就是周初“封召公于北燕”的召公。“堇鼎”是周初时器物，而铭载燕侯命“堇”谒见太保召公奭于宗周，这说明周初召公虽受封

^① 参见琉璃河考古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

于燕，但由于他长期供职于宗周，其后实际统治燕地的乃是他的子辈。《史记索隐》即曾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初封周公旦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后又“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的史实而推测“（召公）亦以元子（即长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253号墓出土的其他几件铜器的铭文则分别记载“圉”受燕侯赏赐和受周王赏赐等事^①。

1981—1983年，考古学者在黄土坡遗址Ⅰ区又发掘西周初期墓葬121座，车马坑21座。墓葬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有3座是带有斜坡墓道的燕国高级贵族墓葬。一般大中型墓葬均有车马陪葬，只是在数量上有所差别，最多者达马14匹、车5辆。陪葬的车辆大多是拆开后埋放，这与Ⅰ区车马坑中的整车埋放不同，显示着周人与殷人在风俗习惯上的不同。

这121座西周燕国墓葬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和玉、石、玛瑙制作的装饰品。陶器绝大部分不是实用器，而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明器，分离、簋、罐三种器形，表面多饰绳纹。铜礼器有鼎、簋、鬲、爵、尊、卣、觥等，且部分带有铭文。如1029号墓出土的一件铜戈，铭文为“匱侯”，分铸在穿木柄处两侧。同墓出土的铜钩戟，铭文为“匱侯舞戈”。又有一件铜泡（估计是盾的中心饰件），背面铭文为“匱侯舞易”^②。这些铜器铭文与以前发现的铜器铭文相比较，虽然没有突破性的内容，但为说明这处遗址的西周燕国文化

①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页。

② 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